



粟裕是如何作总结的

□ 吴 琼

员会扩大会议总结》中，他全面翔实地从苏中各种力量对比、苏中战略地位估计和国际国内局势发展之可能去向及其对苏中之影响等3大方面、11个小方面进行分析，得出清晰的战略判断。

敢于直面问题

粟裕人称“常胜将军”，但他的总结总是敢于直面己方的弱点和问题，重视敌人的优点和经验，从而变成自己的经验。粟裕的总结中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在客观描述基本情况后，尽力找出己方弱点和对方优势。总结韦岗伏击战时，他指出了我军的5项优点，9项缺点；日军的8项优点，5项缺点。黄桥战役这样的神仙仗，他的总结里却详细列举了我军的12个缺点。这种情况在粟裕的作战总结里比比皆是，实事求是，认真诚恳，令人信服。

粟裕直面问题的勇气还突出表现在针对不成功作战行动的专门总结，虚心冷静地面对问题进行检讨，以教育部队吸取教训。1947年7月，华野在南麻作战中遭遇失利，粟裕在《南麻临朐战役检讨》中毫不讳言，直截了当地从战略指导的6条失误（如过分乐观、失去重点、急于求战、轻敌等）、战术缺点的6个方面（如不擅攻坚、侦察不力、协同欠缺、干部缺乏等）及后勤装备准备不充分等多个方面向中央进行了深刻沉痛的检讨，并自请处分。1948年7月，在答复对开封、洛阳等战役的批评时，粟裕说：“对我们所指各点，我们完全接受并进行检讨”，随即进行了细致分析和深刻反思。他的检讨没有任何粉饰推诿，展现了坦荡胸襟和求真务实作风。

锤炼理论素养

在战争年代，粟裕经历了复杂作战区域、多种作战形式和不同作战对手的严峻考验。他不作流水账式的总结，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而是把总结和研究有效结合起来，对重要问题做系统性、前瞻性的研究，从而让感性经验不断上升为更具条理性和综合性的理论成果，成为文武兼备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

粟裕的理论素养突出表现在他对专题问题的系统性总结。1940年4月，在新四军从江南整训、准备向江北战略发展时，他向主力部队指挥员作了《关于组织战斗》的讲授；1941年5月，在新四军一师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现代战争中的参谋工作》的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中，粟裕从人类战争史上军队指挥关系演变和发展谈起，明确指出现代战争不同于以往，它是各种力量的总决战。指战员不但要懂军事，还要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动员和配合。第二次反顽战役结束后，他将自己关于山地作战观点、见解整理成《山地作战问题》一文，对大兵团山地作战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这些为部队尽早完成从平原水网到山地作战转变和从游击战向大兵团运动战转变做了很好的理论准备。此外，粟裕还对军队供给工作、敌军工作、地方武装工作和海上工作等等都做了精辟的专题总结和研究。这些成果既有效指导了当时的工作和战斗，也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军事智慧。

善于驾驭士气

善用兵者多善驾驭士气，持静气而戒骄气，用朝气而弃暮气，从而士气旺盛，所向披靡。粟裕的总结面向广大指战员，为打胜仗服务。他气质沉静刚毅，也以此要求部队。打大胜仗后，他能及时总结经验得失，尤其是立刻就开始打压屡胜之后那种志得意满的骄气。在《黄桥战役总结》的战役缺点部分，他一连指出部队的几个差：通信联络差，射击指挥差，行军力差，供给工作差等。对指挥上也提出严肃批评，如兵团首长不机动，几个纵队配合不好等。在总结苏中反“清剿”斗争时，他严肃指出我方准备不充分这一大问题，包括思想准备不充分、工作准备不充分、执行华中局指示不充分等。粟裕深知，屡胜之后，士气必渐骄，视事较易，从而轻敌致败。戒骄戒躁，成为他在总结经验教训时特别关注的方面。

粟裕的总结，既有好的思想方法指导，又总能根据实际情况，不拘一格，选择适宜形式，体现出独特的工作风格，并无私地帮助广大指战员提高指挥艺术，为我国军事思想与军事艺术发展留下了宝贵财富。

解放战争时期遏美渗华的战略策略

□ 李 峻

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民推翻腐败的独裁统治，争取自由独立解放的大决战，是中国两种命运、两种前途最后的大决战。在这一大决战中，国民党政权对美依赖日深，关系日益不平等，美国则加大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援助。面对这一严峻势态，中国共产党全面分析二战后的国内外形势，克服党内军内恐美崇美的不安心理，谨慎考量对美斗争的战略策略，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尽可能减小并最终遏制了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

形成“中间地带”与“两大阵营”理论以统一思想

冷战初期，建立在美苏战时军事实力均势基础上的雅尔塔体系其实是重绘欧亚政治地图，划分美苏势力范围。当时苏联的综合实力落后于美国，希望在远东与美国妥协以维持现状。同时，斯大林怀疑我党是否能够战胜国民党，认为蒋介石将赢得中国。中国解放战争就是在这样一个国际环境中进行的。

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深刻体认，毛泽东提出了“中间地带”与“两大阵营”的理论，以统一全党全军思想。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丝·斯特朗时说：“美国 and 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倒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毛泽东这一“中间地带”理论揭露了美国进行反苏反共战争

叫嚣的直接目的是要“在反苏的口号下面，疯狂地进攻美国工人和民主分子，和把美国向外扩张的一切对象国都变成美国的附属物”，看到了相对独立于美苏两大阵营的一股中间力量的存在。

毛泽东尽管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甚至主张在两大阵营之间奉行平衡制约的外交，但更明白美苏同我党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苏联是我党的支持者，美国则是中国革命运动的反对者。当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剧烈的和根本性变动的时刻，这种本质的区别大致决定了各方政策演变的趋向。由于美国政府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以及冷战的爆发，毛泽东放弃了与美改善关系的努力。这样，在我党制定外交政策的关键阶段，基本上断定了美国不可能放弃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企图。所以，必须实行“一边倒”的地缘外交总方针。

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战略论断克服恐美心理

抗战后期与战后初期，我党对美国政策与行动的判断是：“在欧洲……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人民解放军如占领南京、上海一类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亦即认为，美国的介入是肯定的，无非是硬介入还是软介入，以及介入力度大小的问题。这种判断是准确的。在美国设想的战后世界图景中，中国应该仍然维持民国时的地位，作为资源流出地区供给农产品，成为工业产品的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在美国主导的

全球金字塔中，中国必须处于底层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中国欲通过革命冲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赢得独立地位，并自主进行现代化建设，摆脱金字塔底层的地位，与美国追求的战略目标有着深刻的矛盾。因此，美国坚定不移地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更加反对由共产党所代表的民族独立诉求和国家发展愿望。抗战时期和战后初期的态势也验证了这一认识。

当时，这一可能交火的敌人异常强大。战后的美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极大增强，科技力量也突飞猛进，成为真正的世界军事强国。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要求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美蒋的压力与要求，我们应当有所让步，但主要的政策不是让步而是斗争。如果我党既有相当的让步，而对其无理压迫与无理要求又能作出坚决的斗争，则其结果比较付出更多更大的让步反而要好些；如无坚决斗争精神，则结果将极坏。

集中力量消灭蒋军是遏制美国介入的最佳手段

美国介入中国内战主要是依靠美援进行。据统计，仅国共谈判的1946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舰艇131艘。从日本投降后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54万人。

但是，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国民党军队的虚弱，使杜鲁门政府援蒋政策遭到美国国内舆论的广泛指责。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特别在1948年至1949年的5个多月时间里，解放军进行战略性大决战，接连发动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三大战役，5个月内共歼灭154万国民党军队。此后，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失败已成定局。正如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8年11月6日致电国务卿马歇尔所说：“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到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于是，美国政府放慢了援助国民党政府的步伐，开始改变对华政策。一方面，美国继续履行《援华法案》，每周仍以400万美元的价值向国民党政府提供军火。另一方面，美国拒绝了蒋介石的一些请求，企图另找出路。1949年1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停止训练国民党军队，并召回美国驻华联合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1月27日，宣布撤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美国政府认为，蒋介石已不是理想的工具，对于美国在华利益已经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希望中途换马，以便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美国直接与李宗仁接触，最终促使蒋介石引退、李宗仁上台。遗憾的是，李宗仁在美国的扶持下，并没有放弃国民党的独裁政治，而蒋介石也没有真正隐退，最终导致和谈彻底破裂。

美国在“失去”中国后，匆匆发表白皮书推卸责任，色厉内荏，表明了不会介入中国内战的态度，我们遏制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战略策略取得了历史性胜利。

13万两黄金送延安

□ 张延升

矿，扎下根，确保完成任务”。苏继光率领革命同志潜入金矿组建地下党组织，成立金矿工会，领导矿工们与日伪军斗智斗勇，用石头换下高品质金矿石，把金矿粉揉进头发，藏到棉袄、鞋底的夹层里，甚至把汞膏（内含品位很高的金子）塞到菜饼子带出来。同时，在黄（县）招（远）公路组织武装力量伏击日军运金车队，直接从日寇手里抢夺黄金和金沙，有一次缴获30公斤金条。三是设立秘密地下黄金收购站，换取群众的黄金。教育当地群众资共不资敌，鼓励群众售金、献金和捐金，在玲珑金矿附近每周能收购50—60两黄金，以特有的方式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

千辛万苦的筹金活动

抗战时期，黄金争夺战弥漫着战火硝烟。对黄金储量丰富的招远玲珑金矿，日本侵略者觊觎已久。1939年2月27日，日军侵占招远县城，28日清晨，日军少川支队纠集700多名日伪军，叫嚣着“宁失招远城，勿失玲珑矿”，强占了玲珑金矿，对玲珑金矿及周边金矿开始了疯狂的掠夺式开采。为全面管制黄金，日军在招远实施“治安强化运动”，成立黄金稽管大队，对私卖黄金一律没收，对亲近和倾向共产党、八路军的人，格杀勿论。日军在玲珑矿区对矿工实施残酷管理和镇压，共有200多名矿工被酷刑折磨致死。

1938年7月，中共胶东特委成立了我党历史上一个独特的金融机构——招远采金管理委员会，1940年8月撤改成立玲珑采金局，领导胶东根据地军民多方筹措黄金，组织根据地军民和矿工同日伪军开展夺金斗争。一是在解放区和敌占区秘密建立、控制金矿，采用合营、合资、租赁、自产等形式生产黄金。设立武装护矿队，挤走保安团等势力，保护矿主生产黄金。二是从日寇手里“虎口夺金”。1939年冬，中共胶东区委书记王文秘密交给胶东区职工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苏继光一项任务：到招远筹集黄金，要求其“像钉子一样深深地钻进金

山根据地，之后到延安就比较安全了。时任鲁中工商局监察专员的孟英讲述，山东分局收集上来的黄金绝大部分送往延安，分局主要领导黎玉亲自安排送金任务，哪个部队送，谁负责，走哪条路线，都绝对保密。1943年初，孟英曾带领一支3个营和1个连的部队运送黄金到津浦铁路路西的根据地，到那里由根据地派部队送往太行山，然后转送延安。1942年3月18日，刘少奇从苏北回延安参加党的七大，到鲁南视察，离开时，携带山东分局送延安的1万两黄金，穿越了103道封锁线，历经9个月才到达延安。

还有运金小分队直接从胶东运送黄金到延安。玲珑金矿原副矿长于谔讲述：1943年秋，战士王德昌参加了一支26人组成的运金小分队，经过一路浴血战斗，到达延安时仅剩6人，黄金却一两未失。神秘的“黄金部队”在向山东分局、向延安护送黄金的行动中，无数英雄血染运金路，却没发生过一起携金叛逃事件，没丢失过一两黄金，彰显出送金人忠诚使命的崇高品质。

困苦交加的雪中送炭

据山东招远县有关档案记载，1937年至1945年，胶东特委和玲珑金矿大约筹集了13万两黄金送到延安党中央。按照《陕甘宁边区九年来财政收支报告》计算，这些黄金相当于1943年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毋庸置疑，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运送到延安的黄金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紧张的财政经济状况。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发经费，各抗日根据地生活十分困难。日伪和国

民党顽固派严控军火、粮食和药品等重要物资输入延安，“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入边区，企图从经济上困死边区和党中央。1940年，延安农民人均粮食不足1石，棉花1941年才达到3个人1斤的水平。部队吃穿、机关运转都难以保证，边区人民的负担也达到了极限。对此，毛泽东回忆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另外，购买枪械、弹药、紧缺的医疗物资以及开展对外活动都需要黄金等“通货”。因此，1939年11月，中央初拟李富春等到山东筹款，毛泽东说：“把票子搞到延安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多搞‘通货’来比较好。”送到延安的黄金，为延安换取紧缺的物资，打破敌人的封锁，起到重大作用。相较于法币、边币等，黄金具有更强的购买力。据计算，在1942年，13万两黄金大约能购买499亿斤小麦。玲珑金矿和胶东根据地送到延安的黄金，还为稳定边币币值、降低通货膨胀、稳定延安经济金融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玲珑金矿又向党中央输送了22万多两黄金，为解放事业作出了新贡献。英雄的玲珑儿女、胶东军民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传承着“13万两黄金送延安”的革命精神，在党的革命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